

第三，自我批判與反省。在各專號之中逐漸有一些文章開始對不同領域作學術史的回顧與反省。例如1999年第2期中有多篇文章討論兩岸宗教研究。1999年第3期一篇名為〈誰的政治思想？為何研究？：台灣政治學界政治思想研究之初步回顧〉的文章，對台灣學界，包括《思與言》在內的學術刊物對政治思想的研究提出質疑與批判。

在台灣雜誌銷售的市場上，《思與言》從來沒有叱咤風雲的熱賣場面，反而在過去十年之間，數

度出現經營危機，幸得發行人與編輯群的堅持才能持續至今，期盼他們能永續經營。經過長期的耕耘，《思與言》無疑已經在台灣學術史上佔有一席之地，未來要了解二十世紀後半葉台灣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學者關懷點的變化、學術與社會的互動等課題，這一本雜誌將是最佳的時代見證。（本文標題「思為綱繆」、「言乃不息」二語採自林安梧先生〈思與言三十年總錄集編後跋〉一文，不敢掠美，謹致謝意。）

讓問題浮出水面

● 孫 歌

《學術思想評論》已經出版四輯，它顯示了越來越自覺的自我定位，這就是嘗試建立以學術為基本立腳點的思想立場。最令人注意的是從第一期開始就被排在最前面的「學術現象論析」，該欄目顯然意在倡導研究者對於自身問題能力的反省運思，以尋找那些真正能夠生長的問題。



《學術思想評論》（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7- ）。

在80年代的啟蒙話語裏，思想啟蒙被一種虛幻的中心意識支撐着，它使得知識界產生的最大錯覺就是認為知識份子可以利用自己的啟蒙話語直接改變社會。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種錯覺在進入90年代之後就不能再維持下去了，它促進了人們對於人文精神的討論，卻沒有引發對於思想與現實關係的追究，這是最大的遺憾。至今，在各種學術場合，我們仍然可以聽到人們談論知識份子要關注現實之類的觀點；而如何介入現實，思想與現實之間有甚麼樣的張力關係等問題，卻很少成為人們關心的對象。正是在這樣的知識氛圍之中，知識立場被最大程度地簡化了：它要麼是學

院派缺乏緊張度的知識性討論；要麼是極其直觀的知識精英介入現實的姿態。而一種新的思想傳統，一種以知識的方式介入現實的思想傳統，在90年代並不能真正生長。

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學術思想評論》問世了。在已經出版的四輯裏，它顯示了越來越自覺的自我定位，這就是嘗試建立以學術為基本立腳點的思想立場。不能說它所發表的文章水平均衡，也不能說它具有鮮明統一的思想立場；也許恰恰是在這種不無內在矛盾的探索之中，《學術思想評論》顯示了它的多種可能性。

綜觀幾期的內容，它大致保持了欄目的持續性。最令人注意的是從第一期開始就被排在最前面的「學術現象論析」。在後面的幾期裏，該欄確定了自己的真正輪廓，這就是「學術問題的發現與提出」。正如賀照田在第二輯這個欄目的編者按裏所指出的那樣，所謂「學術規範」與「問題意識」在當下正在成為新一輪的包裝，它遮蔽着已有學科構架下的原有習慣思路，以及對於西方流行理論和學術運作模式的機械模仿。而該欄目的設置顯然意在揭破這一被惰性所容忍和沿襲的惡劣學風，倡導研究者對於自身問題能力的反省運思，以尋找那些真正能夠生長的問題。

區別真命題與假命題何其容易，更何況在90年代以來，大陸知識界沉醉於學術規範化和方法論討論的情況下，被作為問題而提出的卻未必是真正的問題——在我看來，真正的問題會引發不斷延伸的思考，而不是引向簡單漂亮的結論；建立這樣的思維習慣當然不可

能一蹴而就。「學術問題的發現與提出」欄目中所作的努力將是漫長而艱辛的，它甚至有可能伴隨着各種意義上的迷失；但是它究竟這樣做了。發表在這個欄目中的若干篇論文提出了一些饒有興味的問題，提問者都是中青年學者，而問題的主要着眼點在於對各自學科內部問題生長點的關注和對簡單套用西方理論的批判。稍嫌遺憾的是，提問者沒有表現出太多的疑惑，「指點江山」有餘，自我反思不足。

但是這種狀態也許正真實地反映着大陸學術的某一個側面，那就是知識界尚沒有一種沉下去面對問題的狀態。而在追問甚麼是真問題的時候，我們也不得不追問，學術是甚麼？思想又是甚麼？

呼應這個提問題的專欄，「闡釋與分析」和「學科與學術史」兩個欄目所設定的目標似乎是提供某種示範性的討論，所以編者的目光遍及世界學術界，而不僅僅是大陸有限的學人。在這裏可以讀到美國學者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關於本世紀中國知識份子自我定位和與西方思想傳統格格不入之處的精當論述，也可以在相反的視點上讀到日本學者溝口雄三貼近中國思想史自身脈絡對中國理氣論所進行的綿密分析；可以讀到台灣學者趙剛有關杜威(John Dewey)重建自由主義的論文，也可以讀到美國學者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提示的中國史家們面對着的具體難題。當然，你更可以從這些論文中一道讀到大陸中青年學人在完全不同的文化氛圍中寫作和思考的問題。與登場的海外學人以長者為多的情況相反，大

90年代以來，大陸發生過不少論爭。在論爭「浮出水面」之後，它引發的問題卻沉入了水底。這是因為在論爭中被引用的本土與西方的思想資源，很難以論爭的形式真正獲得在90年代中國知識空間的定位，相反，它們因此而脫離了自己所由產生的具體語境而變得飄忽不定。

當學術界還沒有建立有效區分真問題與花俏時髦的判斷基準時，為了避免把問題糾纏在所謂西方和本土的對立這類毫無價值的爭論上，當務之急也許不在於理論體系的建構，而在於理論問題的提出。《學術思想評論》顯然在嘗試進行這樣的工作。

陸的學人基本上是在文革後才開始寫作的中青年，他們的問題意識裏伴隨着80年代以來特有的思考路向。細細讀來，在這些論文之後你會發現一隻獨具匠心的手在仔細地編排和斟酌，於是這些產生於不同地域和不同學術背景之下的學術論文，竟然在這本雜誌裏獲得了重新組合的可能性，而這種重新組合，造成了90年代後期大陸學術界的一個若隱若現的話語空間。對我個人來說，閱讀這本雜誌的快感不是來自它裏面的某一篇文章，而恰恰是來自它特有的那個話語空間。

90年代以來，大陸發生過不少論爭。在論爭「浮出水面」之後，它引發的問題卻沉入水底。這是因為在論爭中被引用的本土與西方的思想資源，很難以論爭的形式真正獲得在90年代中國知識空間的定位，相反，它們因此而脫離了自己所由產生的具體語境而變得飄忽不定。與這種飄忽相對應，論爭本身的問題性也顯得有些飄忽不定，儘管我們有足夠理由認為多數論爭深化了中國學人對現代社會知識處境以及社會問題的思考，但是這些思考還沒有來得及結出果實，就消散在個人性的研究工作當中了。換言之，論爭的收穫不是造成了對話與交鋒的多重性空間，而是引發了個體性研究和思考的發展。不言而喻，這兩者之間是有區別的，區別就在於多重話語空間的建立有助於形成思考的張力，而個體性的思考，無論它多麼深刻，都會因缺少互動性的張力而無法顯示思想的多面性。

正是在此意義上，《學術思想評論》顯示了一種可貴的品質：它試

圖在呼應當下論爭的意義上營造一個能夠使得問題「浮出水面」、使得論爭本身沉入水底的多重性話語空間。這種努力首先表現為它有意識地開闢專欄翻譯與論爭相關的原始文本，但是卻不直接配合熱門話題。比如在第三輯刊出一組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論現代性的文章，而在其後的第四輯裏又刊出柏林(Isaiah Berlin)的一組關於思想史的論文。我並不把這種選擇簡單地視為賀照田先生的思想立場，我更願意在該雜誌與當下思想界的互動關係中為這種選擇定位。特別是當它同時又刊登了汪暉、劉小楓、鄧正來等人的文章或訪談，更反襯出編者翻譯原文以增加思考深度的匠心。翻譯的位置在中國一向比較含糊，特別是當翻譯被賦予支撐某種論點的功能時，它會合理合法地省略掉原文在自己的語境中與其他文本的互動關係；這種浮躁的風氣的確需要更具有空間意識的翻譯設計加以調整。如果《學術思想評論》有關翻譯的考慮能夠進一步生長，無疑能夠使我們在使用西方的思想資源時有更慎重的考慮。

使問題浮出水面，使論爭沉入水底，要借助於翻譯的力量終究有限。《學術思想評論》所做的更重要也更艱苦的工作，是試圖在中國學術界建立新的思想史和學術史眼光。大陸學界這兩個領域的工作缺少原創性，因為面對着兩個基本的障礙：一個是它過於借重西方的思想史方法，以致於在進入歷史的時候不得不捨棄許多無法納入西方框架的問題；另一個則恰恰相反，是它過於強調思想史與學術史的本土

性，拒絕在世界性的架構之內討論中國的本土問題。即使在那些優秀的學人之中，這兩個基本障礙的糾葛也常常使他們感到討論的力不從心；而更重要的是，當學界似是而非地把使用西方的方法還是使用本土的方法作為一個衡量標準的時候，那些真正具有生長潛能的思考便與簡單的模仿套用混為一談了。當學術界還沒有建立有效區分真問題與花俏時髦的判斷基準時，為了避免把問題糾纏在所謂西方和本土的對立這類毫無價值的爭論上，我們當務之急也許不在於理論體系的建構，而在於理論問題的提出。《學術思想評論》顯然在嘗試進行這樣的

工作，因為它聚焦於學術史與思想史的問題點，試圖走出西方與本土思想史方法對立的怪圈。在此還要提及的一點是：90年代以來，大陸學界的人文學者紛紛心儀社會科學的「硬」學科，而文學出身的主編賀照田卻在這份綜合性刊物中給了文學研究相當多的篇幅，這為文學學科加入當今的跨學科思考並提供自身特有的資源創造了一個前提。

作為一本不斷展示各種發展潛能的雜誌，《學術思想評論》的工作才剛剛開始，我們期待着它進一步生長、拓展，在不斷揚棄取捨的同時完善自身，期待着我們擁有開放而互動的言語空間。

世紀之交的古典自由主義言路

● 止 水



《公共論叢》（北京：三聯書店，1995- ）。

在90年代的大陸思想界中，《公共論叢》被認為是自由主義一脈的代表之一。但據我看來，這麼說稍嫌籠統了一些。不同於人文學者們對胡適之先生的重新肯定，對「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追懷，也異於經濟學者們從效率觀點對市場經濟所做的辯護。整體來看，《公共論叢》最鮮明的特色是自覺地堅持了

在90年代的大陸思想界中，《公共論叢》被認為是自由主義一脈的代表之一。僅就在中國大陸而言，它是中國人自己對古典自由主義第一次最為集中的闡述，這可以說是在世紀之交的中國開了風氣之先。